

跨域青年學者

台灣
一
史

研究第三集

若林正文・松永正義・薛化元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主編
出版

跨域青年學者台灣史研究第三集

若林正丈

松永正義 主編

薛化元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出版
稻鄉出版社 印行

標題雜感——代序

若林正丈*

「標題要好好思考。」

「不能輕忽思考標題這件事。」

「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要不時重新檢視標題。」

「標題要柔軟靈活並掌握本質。」

「正題與副題一定要有清楚明確的結構。」

在指導碩士論文、博士論文時，有關標題，如此嘮叨地對學生說著，已經好幾年了。

論文的主題、「正題與副題」能夠緊密結合，而且「柔軟靈活並掌握本質」的時候，論文主軸便能確立，撰寫到最後的展望也就因此而生。但是，要到達於此並不是那麼容易的。在那之前，還是要不厭其煩地「多次檢視標題。」

當然，這裡所說的「標題」並不單指論文整體的標題。論文各

* 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教授。

章、各節的標題也是一樣。在論文寫作的過程中，從論文整體到大小環節，令標題具有結構的作業，不外乎就是針對今後要書寫的內容、書寫中的內容，或是大致寫完的內容，不斷進行要約的作業。這實際上雖然是論文書寫過程中，在執筆者頭腦裡自動進行著的，但是透過「加上標題」此一外在的作業形式，思考過程也會進一步地清晰明確。只憑直覺是不可靠的。況且，所謂「靈感」等等也不能輕信。只有深切的思考才能摸索到上述所說的「標題」。

之所以要給予學生這樣的指導，是因為自己也有為此而苦的經驗。從大學畢業論文到碩士論文，或是將碩士論文改寫成學會報告論文等等，論文的執筆是痛苦的連續。同樣是辛苦，但能不能是有點「建設性」的痛苦呢？（可以的話，不能再輕鬆一點地寫嗎？）然後，剛好在博士論文（「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的最後階段，撰寫有關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論文之際，我遇到了 KJ 法。這是京都大學文化人類學者川喜田二郎(Kawakita, Jiro)在其暢銷書《發想法》(中央公論新書)中提倡的腦力激盪方式。附帶一提，上述的「標題要柔軟靈活並掌握本質。」正是川喜田教授在這本書上所說的名言。

當時我參考 KJ 法所進行的作業如下。首先，利用已用畢的文件紙大量製作大小約 A4 十六分之一的卡片。在那卡片上，什麼都可以，將閱讀有關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資料時所想到的，依次記入。在覺得大概沒有什麼可以再寫的事項後，將它們全部擺在桌上望著。

我在當時擔任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的助理，辦公室裡有一個很大的會議桌。星期一到星期四是上班日，但是過了下午四點後，在桌邊商談或喝茶的教授或助理教授就不會出現。這是可以盡情試用 KJ 法的機會。一邊望著排在大桌子上的卡片一邊想。將覺得應該歸

為一類的卡片整理在一起後，再想想這堆卡片意味什麼，接著給它們取標題。同樣的作法重覆數回。如此一來，就會出現好幾堆各有標題的卡片，再來將逐漸知道其中又可以再整理出更大的一堆。然後，再想想這堆的相關性，取一個標題。如此，又可發現更深一個層次的統整。繼續反覆同樣的作業。這樣作的話，就可以知道目前為止自己尚未把握好的現象與現象的相關性。總而言之，就可以看清楚之前對自己而言尚不明瞭的論文「梗概」。

如此以後，為了讓「梗概」更加明確，再試著重排這些已經整理好的卡片。試作多次。這樣作下來，之前尚有餘留不明確部分的論文目次，都具有結構性，連比較細微的部分都會變得明瞭。

到這個階段以後，為了保存快要成為目次的這些卡片的配置，我買來大張的模造紙，貼上這些卡片，將之黏貼在書桌後面的書架前。再來，開始進行論文各節、各項的撰寫，一旦打結停頓，就回頭看看這張模造紙。每次都是回顧一直以來的思考過程而前進的。

在本論文集裡一起出現的諸位青年學者們，你們也許已經學到了自己論文作成的技法。更何況，這樣一個將卡片排到桌上的，所謂類比式技法，說不定已經落伍了。只是，撰寫論文的苦，就算是來到數位時代也不會消失，將這些苦轉化得更有建設性的技法本質，也因為人類的頭腦並未發生質的變化，而應該沒有什麼差異。是以，我重新在這裡寫下自己暗中摸索時期的經驗。

2010年5月15日

於日本相模原住所

當時的社會文化，「政治」與「文學」並非完全割裂，而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當時的文學家對政治議題的關心，並非單純的知識興趣，而是因為他們認為文學的使命在於「為人民而寫」，為社會的不平等而抗爭。因此，他們會將政治議題融入文學作品中，以達到社會批判的目的。這點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如《新蜀山記》、《金瓶梅》等，都有明顯的表現。這些作品不僅描寫了社會的不平等，也提出了對社會變遷的批判。同時，這些作品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文化氛圍，如對官場的嘲諷、對社會道德的批評等。這些作品在當時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迴響，成為當時社會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當時的社會文化，「政治」與「文學」並非完全割裂，而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當時的文學家對政治議題的關心，並非單純的知識興趣，而是因為他們認為文學的使命在於「為人民而寫」，為社會的不平等而抗爭。因此，他們會將政治議題融入文學作品中，以達到社會批判的目的。這點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如《新蜀山記》、《金瓶梅》等，都有明顯的表現。這些作品不僅描寫了社會的不平等，也提出了對社會變遷的批判。同時，這些作品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文化氛圍，如對官場的嘲諷、對社會道德的批評等。這些作品在當時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迴響，成為當時社會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感想

松永 正義*

研究台灣時必須要留意的，筆者以為有三點。首先是意識形態的排除，其次是歷史性的考量、最後是跨領域性的思考，這三個側面。

雖然意識形態的排除看起來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其實卻非常困難。如此說明的原因，係因所謂的研究，必須與當今的問題有所關聯，否則便失去其意義，但與當下相關的話又必然要在不同的立場中進行選擇；選擇了某種立場，也就等同於不得不選擇了某種意識形態。問題在於對於這個選擇，研究者是否是有自覺的。

筆者身為外國人的研究者，亟欲理解台灣的一切。換言之，即希望能夠瞭解於台灣各種各樣的思考模式，去理解這些樣態各自不同的思考模式，在每個人的內面裡，是為何、如何生成的。當然筆者自身亦有自身的思考模式，與自身模式的思考不符合者，自然較難以理解，且經常會先對這樣的思考先進行反駁，如此一來則根本

* 一橋大學語言社會研究科教授。

談不上進行瞭解了。但是，在盡可能的範疇內，內在性地努力去理解這些不同的想法，也可以幫助確認自己的所處位置，這樣的一個作業是非常重要的。

至於第二點歷史性的思考，即欲理解一件事情時，必須先將自我投入返回該時代情境中，將該時代以內化的形式來進行思考。日本的台灣研究，開始以台灣自身為研究對象者，當然除了如王育德的《台灣》這樣例外的先驅性研究，可以說大致上都是從 70 年代，戴國輝、許世楷、涂照彥、黃昭堂、劉進慶、戴天昭等人的研究開始。當時所謂的台灣研究，其實是「中華民國研究」，乃至「國民黨研究」。當時的研究今日看來當然有失誤之處，但是會出現這樣的錯誤，也不盡然是毫無原因理由的。首先，在民主化運動尚未有明確集結中樞的情況下，台灣的立場其實難以明確看出；其次，國民黨自身與其說強調以台灣為處理對象，不如說是以中國共產黨為對手的意向更加強烈。如此的態度與環境也不容易看出台灣的立場。例如，蔣介石所提出的漢字簡略化議論，最後仍以墨守繁體字之結果做收，此固與國民黨內保守勢力的反對有關，但最大的理由莫過於大陸採用了簡體字，國民黨作為傳統擁護者的立場不得不採取這樣的處置。順帶一題的是繁體字的採用，也可視為在台灣典型中國化政策的一種面向。但上述的過程可以看作國民黨內之近代化趨向(蔣介石最初的動機)所衍生出的附屬品，亦即這樣的側面主要是在國民黨內保守派、對共產黨政策的各種關係係數修正中之下，台灣不得不承受的一種中國化政策。光從後者的角度來看國民黨的中

國化政策，當然會錯失對當時國民黨性格詮釋的重要面向。

此外，70 年代的民主化運動一詞，含有一種可以概括說為「五四論述」的框架。這與 80 年代的概括性的「本土化論述」框架有著明顯的不同。「五四論述」框架中統獨問題屬於附屬的地位，而「本土化論述」框架中則是主要問題所在。因此若以「本土化論述」的框架來理解 70 年代，那就會漏失掉 70 年代許多重要的面向。

如上述枚舉的例子一般，將問題投回到時代的框架內，於該時代氛圍中從內在去理解，這樣雖然是困難的，卻也是非常重要的。

台灣研究，另一個面向即需要跨領域的研究。為什麼這麼說，是因為台灣研究最終不得不面對「台灣是什麼」這一個問題。而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全面性的視角是必要的。面對實際問題時，為了理解台灣就不得不理解中國，進而又不得不瞭解日本。更進一步來看，要理解戰後台灣，對於美國的亞洲政策、典型的美國消費文化也不得不加以認識。例如 30 年代日本流入美式消費文化，電影、廣播、咖啡館、大眾文學等新文化型態勃興，而在當時政治運動、社會運動崩壞之後，接著開始進入到日中十五年戰爭(譯註：指 1931 年滿洲事件開始到 1945 年波茨坦宣言日本無條件投降為止，所謂的大東亞戰爭期)的時代了。與日本如此的變化，雖然有所時差，但在台灣仍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例如在台灣也出現了《台灣藝術》、《風月報》等大眾雜誌，廣播放送開始，電影院建造、黑膠唱片流通與流行歌的盛行等樣態。緊接其後的，是與戰爭息息相關的皇民化運動時期，但日中戰爭反而縮短了台灣與中國的距離，讓旗袍流行、

中國電影輸入。為了理解一方面與東京，另一方面則與上海連結的台北文化，也不得不去理解同時代下的東京與上海。

在學術研究細分化、專門化的今天，已經無法將研究收束在單純的框架中。筆者以為經常要求需要跨領域性的、全面性的視野，是台灣研究的一種特殊要件。

2010年7月

松永 正義

薛序

薛化元*

由政治大學、東京大學、一橋大學公同主辦的台灣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今年已經是第三屆，而隨著時間與人事的變化，也即將進入新的階段。因此趁這個機會，想回顧這個研討會的緣起與發展，並對支持這個計畫的先進表達感謝之意。這個研討會的經費，是由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補助的。雖然我曾經應邀參加會議，討論相關計畫的構想，不過，教育部公佈計畫後，剛成立的台灣史研究所，卻差點漏掉公文，承蒙當時駐澳大利亞的邱(Julie Chiu)組長告知，才得以趕緊進行申請工作。而東京大學的若林正丈教授、一橋大學的松永正義教授、澳洲蒙納士大學的家博教授都迅速回應我的邀請，並寄給我同意共同進行學術交流的函件，更是計畫可以順利提出的關鍵助力。此外，廣島大學的前田直樹先生也大力協助，促成廣島大學和本所的學術交流。而在計劃展開的第一年，當時文學院王文顏院長協助提供經費邀請國外學者來校演講、交流，使此一合作計畫有了好的開始。而在這個計畫支持下，台灣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

*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會才得以舉行。當然本計劃得以順利進行及延續，教育部的支持是關鍵性的助力，感謝負責的楊淑雅小姐以及審查委員的協助與支持。

雖然研討會計畫設計是以博士生為主，但所謂的青年學者也包括了年輕的助理教授和博士後研究人員。此一研討會舉辦的構想，是希望能提供台灣本土出身的青年學者和國外台灣研究領域訓練的青年學者，一個學術溝通的平台和發表的園地。同時，邀請擔任主持、講評工作國內外的學者專家，不僅組合是國際性的，出身學科背景也相當多元。如此安排使得與會的青年學者，得以接受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學科學者的指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此一研討會的綜合座談，應邀的學者專家都以自己的經驗和專長，提出頗具參考價值的研究意見，甚至是解釋架構給與會者參考。

而除了三所合辦大學負責的教授及各自選派的青年學者與會之外，家博教授也持續參加了三年，而從第二屆開始，愛知大學的黃英哲教授也熱心參與本研討會，並持續推薦學生與會發表。為了擴大參與，政大方面除了公告邀請台灣其他學校相關系所的青年學者報名與會之外，也接受其他國家的青年學者報名，前後有來自荷蘭、中國及英國博士生報名參加本研討會。由於學科訓練及各大學文化的差異，在研討會中的發表、講評、問答，也常常擦出意外的火花，加上每晚會後的學術對話，更充分達到交流的效果。而青年學者的交流與認識，也為日後彼此的合作與交流奠定良好的基礎。

以本屆而言，原本報名發表的人經過初步篩選之後，與會青年學者出身日本大學博士班的有五人，政治大學博士班出身有四人，台灣其他大學博士生有三人，還有一名留學英國的博士生，共計十三人。報告論文的年代從日治到戰後，研究主題包括政治、經濟、

文學、教育文化與族群等範疇，規模雖不算大，卻也呈現了台灣近、現代史研究主題的多元特性。會後循往例先經過匿名審查，再經過編輯委員會的確認(日本方面則經松永正義教授、川島真教授確認)，總共十篇論文，經作者修改後收入本論文集。

在第三屆研討會舉行後，主辦單位雖沒有變更，但是隨著人事的變動，未來工作推動的負責人則有部分變化。其中除一橋大學方面仍由松永正義教授負責外，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的若林正文教授退休，轉往早稻田大學任教，東京大學方面由本屆已經分擔研討會東京大學方面事務的川島真教授繼續推動；而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方面，主辦的工作將由本所的陳翠蓮所長負責。相信隨著人事的變動，將是本研討會和本所國際合作力量的延伸與擴散。

至於從研討會舉行到這本書的出版，除了必須感謝合辦單位的若林正文教授、松永正義教授、川島真教授的協助，台史所陳所長支援研討會工讀生的經費外，還要感謝台史所張嵐妮助教行政上的支援，周俊宇帶領郭凱迪、雷思庭等台史所同學負責研討會的行政事務，程意雯負責會計及研討會後論文集的行政事務的協調，也都是本書出版的重要協力者。而本書的排版工作上，則要謝謝歷史系博士生姚政志的大力幫忙。最後，感謝稻鄉出版社做為台灣學術服務業，對本書印製、發行的協助。

薛化元

2010 年 6 月

目 次

| | |
|---------------------------|----------------|
| 標題雜感——代序 | 若林正丈.... i |
| 感想 | 松永正義.... v |
| 薛序 | 薛化元..... ix |
| | |
| 政治篇 | |
| 石本鑽太郎的軌跡： | |
| 從台灣總督府鴉片官僚到大連市長 | 湯原 健一 5 |
| 國民政府在開羅會議中的 | |
| 戰後對日處置構想：以國防最高委員會 | |
| 國際問題討論會決策過程為中心 | 楊子震 39 |
| 聯合國國際新聞自由會議初探 | 楊秀菁 73 |
| 黨外立法委員對中國政策的主張(1973-1986) | 郭凱迪 97 |
| | |
| 社會・經濟篇 | |
| 從理蕃警察的組成探討蕃人警察地位 | 石丸雅邦 129 |

近代台灣地方菁英的變動：

以簡朗山為例(1872-1945)

陳家豪 183

戰後台灣國營事業經營：

以中國紡織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為例(1949-1967)

莊濠賓 249

教育・文化篇

〈國民學校令〉的殖民地適用：

對施行細則〈國民學校令施行規則〉、

〈台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

朝鮮〈國民學校規程〉之探討

林琪禎 303

試論日治時期日籍基層官僚之雙語併用現象：

以警察通譯兼掌制度為中心

李尚霖 335

「興亞文學」在台灣：

試以《風月報》、《南方》為探討中心

王敬翔 351

政治篇

湯源 健一
楊子震
楊秀菁
郭凱迪

